

鄧文寬

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邓文宽 著

鄧文寬 敦煌天文曆法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 邓文宽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5747-9

I. ①邓… II. ①邓… III. ①敦煌学—古历法—研究
IV. ①P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0618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邓文宽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1) 网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1@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经销 上海灝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625 插页2 字数 387,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747-9

G·511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 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 30 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14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人的成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二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之语),解决问题时思路要开阔,不囿于一种见解,又能提供证据,力求自治;三是“Read Between the Lines”(读书得间),要努力从旧资料中读出新意。总之,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如果不能提供新东西,反复咀嚼前人说过的话,那就离制造学术垃圾不是很远了。

检讨自己已经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感觉喜忧参半。喜者,在于自己一直勤奋工作,至少无愧于人民为我提供的衣食;说得高一点,还为“敦煌学”这门学问增加了一点东西,尽过绵薄之力。至于近 20 年蔓延于社会和文化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与“急功近利”,在我身上并未发生作用,我还是很迂腐地走着自选的学者道路,于学术良心差可告慰。忧者,我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总觉得自己本该做得更好一些,成果更多一些,但一直未能如愿。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三年前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读书人,在生命史上一生都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宇宙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二是知识的无限性与个人能够掌握的知识的极端有限性。这两对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在知识的大海面前,个人未免显得太卑微了,因此,只能选择谦虚谨慎,别无他途。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坚守和言论之责。即使不合时宜,我也仍旧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和健全人格。也许直至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能完全做到,但心向往之,于我足矣。

“任重道远”(张广达师嘱语),我将继续努力。

2010 年 3 月 3 日于北京寓所

学 术 自 述

我自 1975 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步入学术界，迄今已 35 年。1975—1979 年，曾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为国家天文台）古天文组学习和研究天文学史。1979 年，我又考回北大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张广达教授。1982 年毕业后，即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供职，直至 2009 年退休。退休前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首都师大、上海师大兼职教授。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天文学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尤以其中的天文历法文献为主攻方向）。

1979 年读研究生时，我曾考虑以后不再做天文学史的研究，原因在于我是文科出身，缺少必要的数理知识。但跟随导师学习三年之后，深感“敦煌学”的诸多领域都已有不少学者涉足并成果丰硕，而天文历法领域涉足者少，成果有限。犹豫再三，终于决心以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因为我已在天文台工作过四年，具有了一定的初级知识。30 年来，我虽偶尔也涉足别的分支学科，但天文历法史始终是我的基本工作范畴。迄今已出版三种学术作品：《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详见本书后附“著译目录”）。在这些工作中，我曾

经揭示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有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也曾从俄藏敦煌文献中考出公元 834 年的印本历日小残片,进而将从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品实物的绝对年代提前了 34 年(原为公元 868 年的《金刚经》)。此外,在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发现的 10 余件残历的年代亦经我考证而明晰。

我的另外一项工作是关于敦煌禅宗南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92 年起,我与荣新江先生共同着手敦煌本禅宗南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中《六祖坛经》主要由我负责。我们共同出版了《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一书;我自己出版了《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北如闻出版社,1997),《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发表了 10 余篇文章。在这项工作中,我读出了 24 对 100 余处唐五代河西方音替代字,又对《坛经》中的口语词花大力气去解读。需要说明的是,台湾敦煌学界的前辈潘重规教授也正确地解决了《坛经》中的方言替代字问题。不过,我的单篇论文在潘先生出书前已经发表,因此,我与潘老是各自独立完成的。

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用较大精力进行了《敦煌本“邈真赞”校诠》一书的研究与写作。其中,也发现了有 50 余对方音替代字(前人共揭出 14 对)。由于健康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断断续续,迄今尚未将书稿正式交付出版。

除了上述几项主要工作之外,隋唐史、归义军历史、均田制、谱牒、语言文学、简牍学等,我或多或少地都曾涉足并发表过文章。迄今为止,共出版学术作品七本,发表各类文章 150 余篇。

我自问不敏,“勤能补拙”是我时刻牢记的信条。数十年来,除了健康原因,我一直不敢懈怠,加以本师“宠利勿居人前,德业勿落人后”的教诲一直萦绕于耳际,我就只能是“不须扬鞭自奋蹄”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我贯彻三条原则: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对前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1985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7万馀册,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2010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4人,毕业博士54人,14人晋升教授,其中5人任博士生导师,20人晋升副教授,33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馀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馀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2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学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学术自述		1
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		1
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		21
跋敦煌文献中的两次日食记录		29
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		38
敦煌本北魏历日曾有准确月食预报		49
敦煌文献 S. 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		52
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		61
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		
——兼论 S. 3326 号星图的定名问题		69
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		83
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		90
敦煌残历定年		104
敦煌古历丛识		121
敦煌历日与出土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关联		137

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	153
传统历日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连续性	177
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	182
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	192
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	
——兼论“历谱”与“历书”的区别	194
敦煌具注历日与《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	205
“吐蕃纪年法”的再认识	216
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228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720)具注历日》释文补正	238
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考	242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大统历》考	255
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	262
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	271
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	277
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	296
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	305
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	311
居延新简《东汉永元二年(90)历日》考	
——为纪念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319
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形式和符号发微	328

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河西特色	
——以方音通假为依据的探索	337
敦煌本《六祖坛经》口语词释	352
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内容的复原与研究	
——以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为线索	360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	381
《张淮深变文》“骢马政”考实	387
也谈张淮深之死	392
敦煌文献《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管窥	400
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	
——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	416
敦煌邈真赞文献中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例释	426
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	441
敦煌写本《燕子赋》(甲种)“将军”释词	448
敦煌文献《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正	452
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	474
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	486
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读记	493
王珣《伯远帖》与“伯远”考	502
著译目录	507

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

所谓“天文气象占”，就是通常所说的“星占学”，是一种通过观测天象和气象^①变化以占测人事吉凶的数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古人就认为“天”是有人格的，可以赏善或罚恶；而天象的变化，系由人的行为善恶引起。《周易·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古代有关天文气象的占测活动一直十分盛行，并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即“天文气象占”。

由于天文气象占测可以沟通天、人，故历来颇受统治者的重视。历代王朝政府多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以司其职。例如，汉代设有太史，隶属于奉常（也作“太常”）^③，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担任过这一机构的长官“太史令”。唐代设有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监，并具有很高的机密性质^④。这些名目不同的机构，其主要职责都是观测天象和编制历书，亦即为皇帝和朝廷探寻“天意”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建议。因此，天文气象占常常是决断国家政事的一个重要依据。汉宣帝在催促老将赵充国立即用兵匈奴时，曾教训说：“今（前 61 年）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⑤显然，在汉宣帝看来，“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两种天象乃是汉军必胜匈奴的征兆，故严辞责令赵充国火速用兵。不仅如此，天文气象占甚至还在发动宫廷政变时起过重要作用。公元 626 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就曾利用当时太史令傅奕“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的密奏大造舆

论^⑥。当然,由于和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天文气象占在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历代统治者大都视天文气象占术为皇家禁脔,禁止民间私习^⑦。因此,天文气象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数术中影响最大和地位最为特殊的一类。

正因为古代由官方主持的星占活动十分发达,所以有关星占学的著作也就非常丰富。这些著作在古代图书目录中的著录情况比较稳定,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此类书籍都是以“天文”的名义著录于阴阳数术类文献的开头部分。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亦沿袭此法,但将“天文”细分为“天象”、“天文总占”、“竺国天文”、“五星占”、“杂星占”、“日月占”、“风云气候占”、“宝气”等八小类。另外,著录于兵书中的某些军事数术书籍也应属于天文气象占文献。如《隋书·经籍志》兵书类中著录的《对敌占风》、《用兵秘法云气占》、《气经上部占》、《天大芒雾气占》等,就应是专门占测作战吉凶的天文气象占书籍。

不幸的是,早期书目所著录的这些天文气象占书籍大部分都已亡佚,只有极少几种保存下来。尽管如此,与其它数术门类相比,天文气象占类可供研究的传世文献应该说仍然是最多的。例如,我们拥有唐代编纂的《乙巳占》、《开元占经》等大部头天文气象占书籍的全本,还拥有唐代编纂的《天文要录》^⑧、《天地瑞祥志》^⑨的残本,以及北周时编纂并经宋代重编的《灵台秘苑》全本。这些书籍,是研究唐及唐以前天文气象占的基本史料。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正史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即天文学史专家所说的“天学三志”。三志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都与天文星占有关。就研究早期天文气象占而言,当然以其中的《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续汉书·天文志》、《宋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最具史料价值。除上述两类专门书籍外,不少传世文献也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早期天文气象占史料,

可供参考。这主要是:(1)正史以外的其它史书中的材料,如《越绝书·记军气》、《通典·兵典·风云气候杂占》等;(2)诸子书中的记载,如《墨子·迎敌祠》、《淮南子·天文训》等;(3)宋以来出现的天文气象占文献中,保存有部分唐以前的史料,如明代编成的《天元玉历祥异赋》^⑩就对研究早期天文气象占具有参考价值。另外,在纬书(如《河图帝览嬉》)和兵书(如《太白阴经》、《武经总要》)中,也有一些这一方面的记载可供参考。甚至在日本阴阳道保存的古代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中国早期天文气象占方面的材料,如其中的“三家星官簿赞”所载内容就与 P. 2512 的《三家星经》大体一致,说明二者至少有共同的来源^⑪。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献中也有一些天文气象占文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⑫。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星占书通过佛经翻译也大批流入中土,迄今尚存者以《宿曜经》、《摩登伽经》、《曜宿仪轨》等最为有名。这些书籍,对研究唐代前后的天文气象占测,也有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古代著录的天文气象占著作虽多,但完整保存至今的却很少。因此,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类著作就显得格外珍贵。迄今为止,我们从英、法两国所藏敦煌文献中拣选出 19 个编号归入“天文气象占”。这些写本以卷轴装为主,偶有册页装(即 P. 2811、S. 5614 两件),几乎全系残本而少有完整者。一般说来,同一写本所抄内容多属同一性质。但也有少数例外,即同一写本上抄有几种内容互不相干的文献。如 P. 2811 号,前抄天文气象占著作,后抄侯昌业《直谏表》。《直谏表》写于黄巢起义的庚子年,即公元 880 年。经仔细比对,发现《直谏表》与天文气象占书写的笔迹不同,故《直谏表》的抄写年代不能作为天文气象占书抄写年代的参照系数。又如 S. 5614,前部抄《玄象西秦五州占》,后部抄《摩醯首罗卜法》。这两部分性质不同,应分别归入“天文气象占”和“数卜”两类。个别写本系术文献汇抄,故分类时颇费斟酌。

如 P. 3288、S. 2729 两写本在《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后面，都抄有以《太史杂占历》为主要内容的其它占文。类似的占文，又多见于 P. 2610。这些占文中，有属于天文气象占的内容，也有属于《逆刺占》、式法及其它杂术的内容，而多数则与时日选择有关。为便于介绍，现将它们与经常合抄于一起的《玄象西秦五州占》归为一类。

上述 19 件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从内容上又可再分为三小类，即“天文云气书”、“《玄象西秦五州占》”和“佛教天文书”。“天文云气书”是古天文星占书的常见类型，同样性质的文献多见于传世文献。“《玄象西秦五州占》”主要关注和占测西秦五州的吉凶，是一种新发现的天文气象占书籍类型，在传世文献中殊为少见。佛教天文书则是指佛经译本中的天文著作，大致相当于《通志·艺文略》天文类中的“竺国天文”。下面，是具体的分类表：

1. 天文云气书，七件：

P. 2512, P. 2536V, P. 2811, P. 3589R, P. 3794;
S. 2669V, S. 3326。

[敦博 076V]

2. 《玄象西秦五州占》，六件：

P. 2610R+V, P. 2632R, P. 2941R, P. 3288R;
S. 2729V, S. 5614。

[Dh1366V]

3. 佛教天文书，六件：

P. 3055V, P. 3571V, P. 4058CV;
S. 1648, S. 3374, S. 6024。

[Dh519]

除英、法两国所藏外，其它地方收藏的敦煌写本中也有少量的天文气象占文献。如中国甘肃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写本 076 号背面，绘有